

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是怎样破产的?

□孙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经历了两次由分到合的历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6月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两支长期独立作战的红军部队实现了第一次会合;接着却发生了张国焘分裂事件,导致红一、红四方面军分离;经过曲折的斗争,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三个方面军终于在西北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部黄少群在《军事历史研究》撰文指出:以往论著在论述红一、四方面军两次由分到合的历史时,只说明了其“然”,而未说明其“所以然”。本文依据历史资料,着重说明红一、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两次由分到合历程,不仅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反映“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历史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的高度权威性和各路红军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的支持与信任;张国焘闹分裂,则是他个人政治野心、军阀主义的彻底暴露。而张国焘最后叛党而去,也是历史的必然。现将其论述介绍如下: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第一次会合

1933年9月开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军事教条主义瞎指挥下,历经整整一年苦斗,遭到彻底失败。请示共产国际批准,不得不放弃毛泽东、朱德等苦心经营了近6年之久的大块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10日开始战略转移,突围西征,前往湘鄂西根据地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六军团会合。“西征”随后演变成“万里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特别是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防线遭受重大损失,党内、军内高层领导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严重不满,纷纷要求改变党中央和军委的组织领导,于是才有了被称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常委分工他担任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使毛泽东进入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实际上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正是在这次遵义会议的这一人事变化,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随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三大军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国焘是依靠红四方面军起家的。而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张国焘思想深处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意识也不断滋生发展。张国焘于1931年4月到达鄂豫皖苏区,以中共中央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与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代表身份领导当地革命斗争。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鄂豫皖地区的红4军和红25军合编成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在徐向前等的出色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黄安、高漫、苏家埠、潢光4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全军发展到4.5万人,根据地总面积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各县独立师、游击队、赤卫军达20万人。这一重大成绩,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通报嘉奖,张国焘一时名声大噪。在中央苏区举行的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张国焘虽然没有到会,但他仍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仅次于毛泽东和项英。

鄂豫皖苏区的大发展,震惊了蒋介石。原来他认为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是第一劲敌,如今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也成了他的劲敌了,甚至是头号敌人,因为鄂豫皖根据地逼近国民党统治腹心京汉路地带。1932年7月,蒋介石就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时,就决定以30万大军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并亲自坐镇武汉指挥。

可是,这时张国焘和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却被前4次胜利冲昏了头脑。1932年1月,他们在鄂豫皖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发表演说,竟然狂妄:“今后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火线将由帝国主义与苏区直接担负,而国民党和其他军阀部队只担任偏师的任务。”它“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这一荒诞离奇的怪论,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都感到“过分”,即回头批评“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并严厉警告他们说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计划早在蒋介石及其外国顾问的指挥之下订立了,三月一日起正在调军队之中,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武力约在五十师以上,设立了三个清剿司令部(鄂南、鄂东、皖西),可以把它当做无所谓的偏师”不,绝对不能够的。对于国民党这个进攻有丝毫的忽视与苟且就会造成极大的罪恶”轻狂骄纵的张国焘无视临时的这一警告,仍然积极推行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张国焘为什么敢于这样做这是张国焘军阀主义、领袖欲望、两面派、小人得志便猖狂复杂心理的表现。

1928年8月,张国焘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团长是瞿秋白)时,曾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的王明、博古有过一段交恶,在中山大学“教条派”与“支部派”的斗争中,张国焘与瞿秋白一起支持“教条派”,指斥“支部派”(王明、博古等)。应该指出这一行为是正确的,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立场。但到1929年底,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遵照斯大林指示,在中山大学实行“清党”,校长米夫(王明、博古的“恩师”)在打倒了教条派以后,有意将矛头转向中共代表团。张国焘惊出一身冷汗,立即从斗争的漩涡里抽身而退,申请到列宁学院当旁听生,当面向王明等“请教”马列主义。而他内心对王明十分蔑视,称他是“绣花枕头”,表面光鲜,潮涨气燥。张国焘还大批李立三的“路线错误”和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迎合、讨好

共产国际和已担任国际东方部部长的米夫,赢得了共产国际对他的好感。1931年1月中旬,共产国际不但批准张国焘夫妇回国,而且在米夫操纵下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还将他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喜出望外之余,要争取进一步“立功”。2月7日他在《实话》第10期发表《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文章,极力表示拥护四中全会和共产国际,抨击罗章龙等反对派。文章直白地说:“四中全会完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的指导和批准而召集的,现在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张国焘的两面派面目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张国焘的付出很快又得到进一步的回报:应他自己的要求,坐镇上海的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批准他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鄂豫皖苏区指挥一切。张国焘为什么要去鄂豫皖根据地?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地处中原腹地地带,南濒长江,北倚淮河,西扼京汉铁路,东接江淮平原,武汉、安庆、合肥、信阳等大中城市均在其俯瞰之下,威胁着国民党政府的中心统治区域,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经过3年多地方武装暴动和游击战争,苏区已经拥有250万人口,主力红军——红四军发展到4个师共2万余人。其版图面积、居民人口和武装力量仅次于中央苏区,是全国第二大战略根据地。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得意地写道:“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还留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灵(即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张国焘没有说出他的潜台词。他为什么没有选择去第一大苏区中央苏区,而选择第二大苏区鄂豫皖?因为他知道名气比他还大的毛泽东、朱德在中央苏区,他很难超过也很难斗赢那二位;而曾中生名气较小,又是“立三路线拥护者”,拿下他确是“游刃有余”。而且鄂豫皖的战略地位超过中央苏区;立马中原,窥伺京汉,一旦成功,则功盖全党,可以拥兵自重、据地称王。这是张国焘真正“为之向往”的目的所在,也是他政治野心和领袖欲望的端倪初露。

鄂豫皖4次战役的大胜利,张国焘为之沾沾自喜,他向成功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手握重兵,此时如何肯听命临时中央“那个小伙子”(当时党内对博古的蔑称)。博古以24岁如此年轻和非中央委员人主中央政治局,在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既无权威,亦不受尊重。张国焘坚持攻打中心城市的主张,因为他认为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不仅是临时中央的既定路线,更是共产国际的一贯方针。所以他有恃无恐,将临时中央博古等的批评置诸脑后,在“偏师”思想指导下,盲目冒险,不但不做反“围剿”的准备,反而于1932年6月中旬命令红军主力出击平汉路,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以实现所谓威逼武汉的计划。这样,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在国民党重兵进攻下,根据地中央湖北黄安、七里坪和蕲春相继丧失。红四方面军从前线撤回,保卫根据地,来回奔波,损失巨大。威风尽失,惊慌失措的张国焘,于9月13日、24日,连电临时中央告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中共中央总局(1931年初成立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并指挥中央根据地红军的最高指挥)书记周恩来,以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临时中央转来的张国焘的告急电报后,立即回电,对红四方面军如何摆脱被敌人包围的困境提出正确建议,但此时的张国焘已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不但不能执行这一正确的方针,反而于10月中旬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两万多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只留下少数部队先后组成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当地艰苦奋战。

一段时间,党史学界曾经认为红四方面军主动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是执行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结果。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修党史,这个结论被推翻。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人之一的李先念在1982年11月9日接受党史部门采访时说:“有人说,退出鄂豫皖不对,我看退也不对,是被逼着出来的。自古有语: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怎么能让我们那么多人在他跟前争地盘?”第四次“围剿”他亲自到武汉坐镇,是专门对付鄂豫皖的。当时蒋介石已经统一了江苏、浙江、安徽,我们打了岳维峻,他又统一了河南,统一了湖北。所以,留在鄂豫皖固然是不行的。如果说,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还可能第五次“围剿”,第六次“围剿”。再说,那项政策也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徐向前(徐向前)交换过意见,鄂豫皖退出来是对的,那个地方长期占不住。”

徐向前也这样说过,红四方面军主动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是对的,只是留下的部队少了,如果留下一个军,情况就可能不同。不过,笔者认为:从当时大势看,退出来是对的;但从张国焘个人心理分析,他是被敌军的强势吓退的。这从后来长征中张国焘的实际表现也可证明他害怕和国民党大军正面对峙。

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后,经过千辛万苦,浴血奋战,翻越秦岭,渡过汉水,历时两个多月,行程3000里,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到川北地区。由于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正确指挥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当地贫苦群众的热烈拥护,四川地方军阀连年混战,较快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并使根据地迅速扩大到4.2万平方公里,500余万人口,红军扩大到8万人,这也是红四方面军发展的高峰期。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为此,需要活跃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的配合和支持。1月22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牵制刘敌(指国民党军刘湘四“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湘所属的川军),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西进攻。”所谓“西线”,就是指与川陕根据地隔江相望的嘉陵江以西地区。

张国焘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令,领导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造成与中央红军相互配合的极为有利的形势。但张国焘悲观估计革命形势,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能分兵作战。拒绝徐向前等的正确意见,将根据地的部队和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实际上又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张国焘一贯的右倾惧敌思想和行动,不可避免地要在会师后的红一、红四方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上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如果红四方面军不退出川陕根据地,而是在嘉陵江东、西两岸活动,那么,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有这样一大块根据地作基地,中国革命将可能是一种更好的局面。

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军级以上干部在四川江油开会,有些干部对全部退出川陕根据地提出批评。张国焘辩解称,撤出川陕苏区是为了迎接正在北进的中央红军,两军会合后将在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赤化四川、西康、陕西、甘肃、宁夏。大家一听说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那时包括张国焘在内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都热切期盼两军会合,憧憬着会师后的光明前景。李先念后来回忆说:“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都迷信张国焘。有人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确实有些冤枉。那天一听说党中央来的,比圣贤还尊重。”接着,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李先念率第80师和第9军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可以看到,这时的张国焘执行中央指示还是兢兢的。

5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北进途中到达达维镇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一师会合。6月25日两军在两河口举行会师大会。

如上所述,红一、四方面军的第一次会合,是张国焘遵照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命令实现的,体现了“党指挥枪”原则的权威性。而能够发生的张国焘闹分裂事件,则是张国焘个人劣根性发展的结果。

从两河口会议到毛儿盖会议与张国焘的博弈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川西北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稀少,经济贫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西北的陕甘地区,汉族居民较多,物产较丰富,地域宽阔,交通方便,同时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却惧怕和国民党大军正面对抗,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人烟稀少的西康、青海、新疆等地,后来又主张南下。

两军主力会师前夕,在电报往来中,张国焘与党中央在红军发展战略方向上发生了争论。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北上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府的战略计划。17日,张国焘、陈昌浩回电中共中央,提出南下主张。18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到达懋功县城,就地战略进攻方向向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指出:目前形势需集大力向北突破平武、松潘,以为向北转移枢纽,是此时主要一着。而向雅、名、邓、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能进前途,“望即下决心为要”。20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要求红军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红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打岷江,南取天全、芦山、灌县、岷县、名山,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当天即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应从胡宗南或刘湘防线突破任何一,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仔细考虑!”并谓张国焘“立即赶来邀功,以便商决一切”。

为了解决红军发展战略方针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张国焘亦从茂县赶来参加。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周恩来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和军事行动方针的报告,着重阐述了在松潘、岷县、岷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不利因素,及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性。

张国焘在发言中,一方面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另一方面却大力鼓吹他的南下主张。由于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按上述名单排列依据会上发言顺序都支持周恩来的报告,会议一致同意包括张国焘中央的“北上”方针。根据周恩来报告精神,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决定》要求,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

张国焘为何昧于大势公然反对中央的正确方针?这是因为两军会合时,他看到中央红军一

路征战,人数较少,疲惫不堪,服装破烂,武器不全,不像个军队的样子;而红四方面军拥兵8万,兵强马壮,服装整齐,士气高昂,实力明显比红一方面军强。会师大会后,张国焘别有用心地向周恩来询问一方面军的实力,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心底一直有的军阀主义、枪杆子主义、政治野心、领袖欲望一下子就膨胀起来。

为贯彻“北上”战略方针,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为了团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一道北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以统一两军指挥,实现北上战略方针提供组织保证。

为执行《松潘战役计划》,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7月16日,先头部队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等待红四方面军到来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道路。

但是,张国焘不听党中央指挥。一方面,他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另一方面延宕北上,要求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借机向党中央要权,策动一部分人向党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并独揽“独断专行”大权。

为了顾全大局,7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得不紧急商议议决“人事问题”。张闻天表示为了团结的大计,可以将其担任的总书记一职让给张国焘。毛泽东不赞同,认为“此职不能让”他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最后,周恩来提出并经大家同意将他担任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

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张闻天代表中央宣布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借机又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想将他的亲信安插到中革军委,以将军委控制在他的手中。由于毛泽东委婉地制止,张国焘的企图没有得逞。

张国焘为了实现其控制中革军委的政治野心,暗中进行非组织活动。他想拉拢聂荣臻和彭德怀。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还决定给他们补充两个团的兵力;又派人给彭德怀“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遭到聂荣臻和彭德怀的拒绝后,他和陈昌浩又分别去拉拢博古和凯丰。张国焘知道,遵义会议上博古和凯丰都是受批判者。张国焘挑拨地对博古说遵义会议决议不合法,红四方面军不同意。博古和凯丰都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张国焘的拉拢,并告诫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不要搞分裂。同时,博古还对张国焘的旧部队习气提出了忠告,劝他改掉军阀作风。张国焘气呼呼地走了。但是博古却大大“得罪”了张国焘。此时博古代替生病的李富春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张国焘的一再反对,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少离会议,不得不决定博古让出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改由陈昌浩兼任。后来博古还气愤地批评了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陈昌浩,说他作为总政治部主任,连自己的秘书廖承志都不救,责问他张国焘的家长制、军阀作风熟视无睹,任凭张国焘横行霸道,其党性何在。陈昌浩无言以对,只好告辞。毛泽东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对周恩来讲博古是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称赞博古。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进一步团结,不仅对彻底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胜利完成中央红军的长征,更是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由于张国焘的蓄意阻挠,故意延宕北上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无法实施。随后,红军总部于8月3日另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北上,经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北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红一、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重申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会议要求必须在红军中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情绪,实际上这是对张国焘的批评。张国焘在会上发言,仍然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表示怀疑。会议在组织上再一次迁就了张国焘,决定增补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人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张国焘还不满足,进一步提出提拔干部进中央的要求,被毛泽东顶了回去。会议同时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当前前的政情、地形、气候、粮食都适宜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要求左路军迅速行动。张国焘仍不执行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并极力排斥在左路军中坚决拥护中央的朱德和刘伯承。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鉴于周恩来患病,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这是党内常委临时分工。但从此在军事领导上“毛正周副”的局面就开始确定下来了。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又召开扩大会议,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即将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长征新观察》一书。该书以学术的视野、专题的形式,讲述长征历史知识,归纳长征热点问题,综述长征若干历史问题的学术争鸣和代表观点,对于拓宽读者视野、深度了解历史、感受长征精神很有价值。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本报独家连载该书一些内容以飨读者,共同纪念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再次阐述了北上方针,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两个方面军会合,执行《夏(河)战役计划》。《决定》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因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支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根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能力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从而揭示了张国焘错误的要害。

8月21日,毛儿盖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及其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经数日艰苦行军,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史料记载,从8月24日起,至9月14日,中共中央连发7封电报(8月24日、9月1日、9月8日上午及晚上、9月10日、9月11日、9月14日),催促左路军北上,语意恳切,言之谆谆。但这时仍在阿坝的张国焘一意孤行,根本不听从中央劝说,甚至于9月9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上,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军决不可分开行动”,意即要右路军随他南下。对于这封电报,朱德表示反对,坚持没有签字。张国焘又背着中央电陈昌浩,要求其率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张国焘的错误时曾说:“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剑刃把秘密的命命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中共中央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脱离险境先行单独北上后,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徐向前坚决阻止,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从而避免了红军自相残杀的悲剧。徐向前元帅功莫大焉!

接着,又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带着几个人骑马追上了已经踏上北上征程的中共中央及其部队。“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还是对咱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当毛泽东和李特争论时,原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发现李特的手摸着腰里的手枪。李德赶紧上去一把抱住李特,不让他拔枪。李德身高马大,又是国际顾问,李特不敢不买账,从而又避免了一场祸端。

从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到7月18日的芦花会议,8月4日的沙窝会议,再到8月20日的毛儿盖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最为屈辱的一段历程。在将近60天的日子里,中共中央面对的并不仅是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阀,也不仅是杀人于无形的饥饿、寒冷、雪山、沼泽,更主要的是曾经作为同志的张国焘自恃8万大军杀气腾腾的威胁。一方是咄咄逼人步步索权、陈兵耀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方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共同北上。为了团结和争取张国焘北上,中共中央真正是仁至义尽。

9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再次致电张国焘,要求其率部北上。张国焘还是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率部北上途中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决定指出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边陲退却的错误;揭示了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抗日前线的中国西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张国焘错误的性质是分裂党、分裂红军,表现了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他对于中央的耐心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向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决定要求,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中央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促使其北上。为了继续教育和争取张国焘,俄界会议作出的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党外公开。

然而,张国焘坚持错误,军阀主义倾向恶性发展到了顶点。他错误地以为中共中央率领人数不多的部队北上,已不成气候。10月5日,他公然在四川省番县卓木雕(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中央委员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工作。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中华苏维埃政府、红一方面军也只能称陕甘政府和北路军。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鉴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和分裂红军错误的严重性,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所谓“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分裂活动。并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

(下转 A6版)